

-兼論美國近代社會復歸法案 之借鏡^{*}

許春金**、呂宜芬***、游伊君**** 黄富源****、蔡德輝*****

DOI: 10.6460/CPCP.202212_(33).04 本篇文章業經雙向匿名審查通過。

本文資料收集由科技部贊助(研究計畫編號: MOST 108-2410-H-305-064 & 109-2410-H-305-068),研究通過研究倫理審查。本文陳述為作者意見,與經費贊助單位無涉,且無利益衝突。

**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校區犯罪學博士。

******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系講座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美國聖休斯頓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博士。

*******·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系講座教授,美國弗羅里達州立大學犯罪學博士。

要目

壹、前 言

貳、犯罪人集中性與長期隔 離刑

- 一、慢性犯罪者與長期隔 離刑
- 二、慢性犯罪者之概念和政 策問題
- 三、慢性犯罪者實證問題之 臺灣資料檢視:資料顯 示,年齡對犯罪的影響 強大

四、臺灣資料之檢視小結

- 參、刑事司法政策反思:催生 替代方案以助更生人復歸 社會
 - 一、第二次機會法案 (The Second Chance Act)
 - 二、工作申請資料,禁止詢 問犯罪紀錄(Ban-the-Box)
 - 三、前科紀錄自動消除制度 (Automatic Criminal Record Expungement)
 - 四、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

五、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 罪(Deferred Adjudication of Guilt)

肆、結論與討論

- 一、雖然犯罪的集中性現象 是非常重要值得關注的 議題,但本文指出慢性 犯罪或習慣犯之概念效 度仍薄弱,因之而發展 的長期隔離刑亦引發社 會正義、監獄擁擠及合 適的社會復歸議題
- 二、美國本世紀以來的各式 社會復歸法案或策略, 深值我國研究作為協助 受刑人社會復歸、減緩 犯罪集中性及高累再犯 之對策
- 三、政策成效必須以科學研 究方法加以評估,大量 的實證研究積累有助於 釐清政策帶來的效應

摘要

犯罪學研究已累積相當豐富之犯罪人集中現象(即:所謂慢性犯罪者現象或80/20法則)實證文獻,刑事司法處遇對策上多以長期監禁策略為因應。然而,長期監禁策略不僅易造成監獄擁擠現象,並且受刑人復歸社會益形困難,引發美國學術界與實務界熱烈地討論,反思長期隔離刑政策的妥適性。本文首先檢視慢性犯罪者之本質概念,發現慢性犯罪者的「概念和政策」具大眾吸引力,但易陷入犯罪原因分類和政策處遇分類之複雜性和困難性、慢性犯罪者精準預測工具仍缺乏、慢性犯罪者之概念效度(conceptual validity)仍未建立且長期監禁犯罪最高點的青少年犯具政策倫理問題。

其次,年齡與犯罪關係之實證資料亦顯示,老化 (aging)影響犯罪甚鉅,犯罪隨著年齡增加而逐漸減少 (包括慢性犯罪者亦復如此),換言之,所謂「慢性犯罪 者」隨著年齡增加而逐漸減少,說明長期監禁之無必要性。

有鑑於上述,本文建議我們應以循證式(evidencebased)科學方法進一步思考慢性犯罪者之概念,並借鏡美 國近年各項社會復歸法制改革策略,正視慢性犯罪者社會復 歸的各項挑戰,建構更良好的刑事政策。

關鍵詞:慢性犯罪者、長期隔離刑、附加後果、再犯、刑事司 法政策改革

Chronic Offenders, Selective Incapacit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Modern Reentry Laws in the U.S.A.

Chuen-Jim Sheu* & Yi-Fen Lu** & Yi-Chun Yu*** & Fu-Yuan Huang**** & Te-Hui Tsai*****

Abstract

Theoriz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offenders has been accumulated ample empirical-evidenced research in criminology, and selective incapacitation is often used as a strategy to solve the problem. Mass long-term incarceration, however, fails to show the effect of crime prevention, yet being resulted in prison crowded and more obstacles to ex-prisoners to re-enter the society. The academia and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rt to realize the problem and conduct great extensive discussions about the

_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Ming Chuan University; Ph.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Ming Chuan University; Ph.D.,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Ming Chuan University; M.A.,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 Chair Professor & Dean of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Ming Chuan University; Ph.D.,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Ming Chuan University; Ph.D.,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appropriateness of selective incapacit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laborate the potential setbacks resulting from the essential concept of chronic criminals and its relevant public policies. The concept and policies of chronic criminals are attractive to the public, but it is easy to fall into various traps, such as complexities and difficulties of classifying crime causes and punishments, lack of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measures for chronic offenders, absence of the conceptual validity for chronic offenders, and ethical problems resulted from a long-term imprisonment of juvenile offenders.

Moreover, the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crime have also shown that aging has a pronounced impact on criminal involvement. Crime gradually decreases with age (including chronic offenders). In other words, the number of the so-called chronic offenders gradually decreases as age increases, indicating the unnecessity for selective incapacitation.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cept of chronic offenders should be further considered with an evidence-based scientific methods, and the recent American legal reforms of reentry to society are worth reference. Face up to the challenges of social reintegration of chronic offenders in order to establish better criminal justice policies.

Keywords: Chronic Offenders, Selective Incapacitation,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Recidivism,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Reform

壹、前 言

實證研究資料不斷顯示,無論是偏差行為、犯罪、被害、或犯罪發生地,都有集中的現象,也就是多數的事件卻發生於少數的人和地點。例如,國內的研究文獻指出,2009年至2016年,刑事局約12%登錄有案之嫌疑人,其犯下的案件約占42%(許春金等,2018);另外,分析追蹤青少年犯罪被逮捕紀錄(許春金等,2012;葉碧翠等,2019)、初次毒品施用者再犯施用毒品(鄭勝天,2020)、成年受保護管束假釋者再犯(李明謹,2018)、初犯定罪者再被定罪(石玉華,2011)、以及因第三、四級毒品受行政裁罰者(許春金等,2014)等資料,均發現多數的案件由少數人犯下。

犯罪集中於少數人的討論與發現引發防治對策之研究,並有其刑事政策上的貢獻。長久以來,犯罪學者及刑事司法實務工作者相當依賴犯罪人集中性原則來提供或引導犯罪預防策略,例如:美國1980年代末期在各州及聯邦逐漸興起的長期隔離刑(long-term incarceration or incapacitation)即主張,既然少數犯罪人犯了多數的罪刑,如能將這些慢性犯/持續犯等長期隔離監禁於獄中,則應可收到最好的犯罪預防效果,減少最多的犯罪事件(Greenwood & Abrahamse, 1982)。另外,亦有學者主張,針對這些高風險的犯罪人應實施「密集式的矯治」(intensive rehabilitation),以收到最佳的矯治效益(Lowenkamp & Latessa, 2004)。最後,情境犯罪預防論

者亦主張,應可針對慢性犯罪者實施認知教育,以改變他們對犯罪機會的認知,從而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Clarke ed., 1997)。

然而,基於犯罪人集中性而建構之防治慢性犯/持續犯/生涯犯等之策略,不無存在著本質邏輯論點問題及執行困境。舉例來說,目前實務上仍然缺乏早期預測犯罪會集中於哪些人身上之能力,而一旦發現集中現象產生,這些長年之持續犯大多已經處於犯罪力(尤其是嚴重暴力犯罪)下降之人生階段(即年紀大了),此時再予以長期監禁隔離已欠缺實質效益了。不僅如此,長期隔離對政府預算造成龐大負擔,甚或監獄擁擠及社會成本(犯罪人家庭缺乏經濟來源)加重。凡此均說明有必要對此概念及衍生之政策加以檢視探討。

本文從運用長期隔離刑解決犯罪人集中性問題出發, 首先檢視慢性犯罪者概念上和依其理論所衍生之政策上可 能產生的挑戰。其次,由於慢性犯罪者之社會復歸引發關 注,繼而整理介紹近期美國針對策進犯罪人積極社會復歸 實施之重要的社會與刑事政策革新,希望對降低長期隔離 刑之弊病能有所啟發。

貳、犯罪人集中性與長期隔離刑

犯罪發生於少數人之集中現象,因而產生所謂的慢性 犯罪者,成為犯罪防治政策首當關注之族群,認為解決這 些人的問題代表解決社會大部分的犯罪問題,基於這樣的

想法而制定的許多犯罪防治政策中,最典型的則莫過於長期隔離刑之刑事政策。

一、慢性犯罪者與長期隔離刑

雖然犯罪集中在少數犯罪人身上,但最常被使用的相對應刑事政策卻是長期隔離刑,認為只要「及早」找到這些未來的慢性犯罪者,將這些人長期隔離於社會之外,犯罪即可大幅減少,甚或得到預防,社會即可恢復平靜。根據Gottfredson和Hirschi(1986)的說法,當代社會對這種犯罪人不斷再犯與集中性的關注,和隔離刑刑事政策發展,可說主要受Wolfgang等(1972)研究發現6%犯罪人解釋51.9%犯罪事件的影響,Wolfgang等人稱呼這6%的犯罪人為「慢性犯罪者」(Chronic offenders),該項發現是影響美國後來刑事政策趨向長期隔離刑甚或三振法案(The Three-strikes Law)的主要關鍵因素。

Gottfredson和Hirschi(1986)指出,慢性犯罪者的概念始自20世紀初期,當時許多西方國家紛紛組成特別的委員會以便提供政府處理「習慣性犯罪者」(habitual criminal)的策略,自此以後它就是刑事司法研究的標誌,更有許多重要的刑事政策和公共政策研究,尤其有關習慣犯犯罪控制方面。然而,當代對慢性犯罪者的興趣和熱情並非來自該概念之研究知識累積或改進,而主要是受Wolfgang等人(1972)研究之影響。事實上,過去100年來對慢性犯罪者之概念或研究並無太大進步。

但即使如此,時隔40年之後, Walker (2015)評論

Wolfgang等人的慢性犯罪者劃時代研究發現指出,這個概念啟動了對生涯犯罪人¹(career criminal)的嶄新犯罪控制策略,犯罪學術界並對生涯犯罪人的解釋、預測等開展了洶湧浪濤般的研究。而Wolfgang等人的集中性統計6%犯了全部犯罪數的51.9%也突然變得聲名大噪起來。Walker(2015, p. 67)指出,犯罪學者花了好多時間和精力來回答一些基本的問題,如:誰是生涯犯罪人?早期可預測嗎?每一個人犯了多少罪?他們的犯罪生涯有多久?何時可停止?刑事司法要如何干預使他們早些停止犯罪?Walker的這一番話可說是過往犯罪學術界對有關慢性犯罪者或生涯犯罪人研究仍存疑惑的寫照。

即使著名的犯罪學者如Sampson和Laub(2005)亦不能例外地要對有關慢性犯罪者或生涯犯罪人的議題,提出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age-grade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theory)觀點。由於他們的資料可對犯罪人更長期且準確地觀察至70歲,他們卻有與慢性犯罪主張者不同的結論:我們發現對所有犯罪與男性而言,生命史的犯罪中止是一規則,包括輕微偏差類型;同時……我們質疑對於罪犯團體的預期性或預測能力(作者註:包含慢性犯罪者或生涯犯罪人),以及他們日後的犯罪軌道上是否會有因果差異("We find life-course desistance is the norm for all

¹ 在本文中,慢性犯罪者 (chronic offender)、生涯犯罪人 (career criminal)、持續犯 (persistent offender)及習慣犯 (habitual offender)等均同義。

men and all crimes, including minor forms of deviance; and ... we question the prospective or predictive power of offender groups and whether they are causally distinct with respect to later trajectories.") (p. 18) •

由此可見,慢性犯罪者或生涯犯罪人在犯罪學研究和犯罪預防政策上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以Gottfredson和Hirschi(1986, p. 215)列舉的4個早年有關習慣犯或慢性犯罪者之相關定義,以便讓讀者對慢性犯或習慣犯的特徵有進一步的認識:

- (一)1895年英國委員會(British Committee):「蓄意持久地習得犯罪習性」;
- (二)1951年Morris: 1.在心智結構上有犯罪的屬性², 2.有固定的犯罪方式, 3.造成公共危險;
- (三)1980年著名的生涯犯研究者Petersilia:高程度且 永續的參與嚴重性犯罪;
- (四)美國司法部於1983年的定義:有多種嚴重犯罪之逮捕、定罪前科者,或相當多數不同嚴重程度之逮捕、定罪前科者。

無論使用哪一個定義,不待有關慢性犯罪者之諸多實證研究發現,各國均有相對應的刑事政策或刑事法律處理此類型犯罪者,且大都以加重(長)刑期為基本的方針或政策。例如,美國Sigler和Culliver(1990)指出,至1990

² 犯罪心理學者大多認為這類人具反社會性格或認知能力缺陷。

年美國共有43州立法通過相關習慣犯法律(Habitual Offender Act),New York早在20世紀初即有持續重罪者法案(Persistent Felony Offender Act)、英國Radzinowicz和Hood(1980)則指出,最早的立法例可追溯至1863年、德國Mannheim更早在1933年指出,當年德國立法通過德國「犯罪行為預防法」(German Prevention of Crime Act)加重處罰犯罪三次以上之危險犯等。美國聯邦政府也在1994年實施「暴力犯罪控制與執法法案」(The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成為對抗暴力犯罪之主要策略。至2012年止,全美有30州重新制定實施三振法律(Legal Match, 2020)。該法通常會規定三犯嚴重暴力犯罪加上一或二項前科定罪者須服刑25年至終身監禁,通稱為三振法案(The Threestrikes Law)。

雖然諸多習慣犯立法例均以「危險犯」之概念為基礎,但如Widom(2014)所言,危險犯亦是「持續犯罪者」之一類型。而各國對於持續犯罪者或習慣犯處遇主軸均以「長期監禁」為主。這也造成監獄過於擁擠或超收的現象之其中一原因,更造成受刑人復歸社會的困難,臺灣亦不脫離此一世界潮流。

臺灣有關習慣犯之防治方針主要規定在刑法第90條、 第47條和第77條。刑法第90條規定,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 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處所,強 制工作1年6個月至4年6個月。不過,大法官會議已於2021

年12月10日作出釋字第812號解釋,認定刑法第90條、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有關強制工作的相關規定,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和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意旨,故自解釋公布日起失效。

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 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不過,大法官會議於 2019年2月22日公告釋字第775號解釋,認為雖然刑法第47 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乃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刑罰反 應力薄弱等,故一律加重最低本刑,然而,這規定不分情 節,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條款所定要件之情形 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 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違反憲法保障人身 自由所為之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的比 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換言之,如果刑法第59條可 適用,累犯加重「最低」本刑未使行為人失去人身自由, 累犯加重「最低」本刑沒有違憲,反之,若刑法第59條不 可適用,目個案衡量發生罪刑不相當時,一律加重累犯 「最低」本刑之規定,則屬違憲。因此,大法官會議第 775號解釋僅就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作出小範圍的違憲 解釋。

刑法第77條第2款規定,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之「累犯」,於假釋期間,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 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者,不適用假釋之規定。此即重罪三犯者不 得假釋之規定,等同於三振法案。

不僅如此,在2006年實施的現行新刑法中,由於廢除 了為刑事政策與科刑便利而創設的連續犯與牽連犯的規 定,改為一罪一罰,使得犯罪行為人較可能受到長期刑的 司法處分。尤其在連續犯的規定廢除後,犯罪行為人被認 定為習慣犯的可能性亦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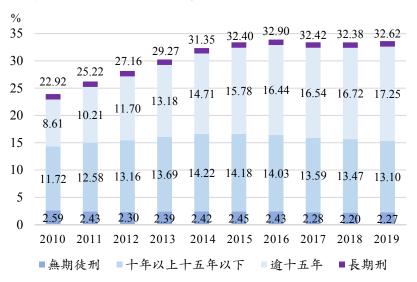
綜觀上述,即便近年相關違憲討論已陸續出現,臺灣對於習慣犯之處遇策略亦與他國類似,以長期隔離刑為主,加重(長)刑期為手段。回顧有關慢性犯罪者之相關研究,對於以循證為基礎(evidence-based)之刑事政策,有關慢性犯罪者生命歷程之特徵、影響因素及預防策略等較為詳細兼具質性與量化發現尚待更多的研究。

再觀察臺灣近年來矯正機關收容受刑人累再犯狀況 (含矯正學校之少年受刑人),就監獄新收受刑人初犯與 再累犯之比例而言,新入監受刑人累再犯比例一直是居高 不下,並且逐年增加,2012年監獄受刑人累再犯比例突破 70%,2019年之統計顯示,監獄新入監受刑人累再犯之比 例高達79.62%。監獄中長期刑人數不斷增加(如圖1所 示),從2010年至2019年,長期刑³受刑人占比逐年上 升,從2010年的22.92%(13,087人)上升至2019年的

³ 長期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

32.62%(18,360人)。顯示臺灣矯正機構目前承受著沉重 的負擔與壓力,而這或許與近年來刑事司法政策密切相 關,強調嚴格的處遇制度,例如廢除連續犯,採行一罪一 罰,並提高無期徒刑的假釋門檻等。這些累再犯中應包含 不在少數的慢性犯罪者,社會對於這些人之矯治復歸更需 有良好策略規劃與實證研究的支持。

圖1 在監長期刑受刑人刑期分布



註:法務部矯正署矯正統計——監獄在監受刑人應執行刑刑名

二、慢性犯罪者之概念和政策問題

(一)慢性犯罪者的「概念和政策」具大眾吸引力,但易陷入犯罪原因分類和政策處遇分類之複雜性和困難性

慢性犯罪者或持續犯的概念指出,有些人會追尋犯罪 很長一段時間,而且在事先就已決定要追尋犯罪一段時 間。而這些行為可以由於政府的干預而受到預防。尤其, 可以藉著運用較少資源,針對這批慢性犯罪者進行干預處 遇,而得到更好的政策效果,這種概念上和政策上的吸引 力是很明顯的。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藉著犯罪的次數、犯罪的特性或犯罪的期間等之標準而界定慢性犯罪者或持續犯罪人,那意味著我們可以區隔出某種特殊類型犯罪人——相對於一般犯罪人,如偶發犯、輕微犯罪人等。因此,我們至少可以找出兩類犯罪人,但也可能分類出更多種類犯罪人。最終,我們會努力區隔不同類型犯罪人,然後尋找不同的犯罪原因理論和政策方向。這樣,犯罪學的理論和刑事政策就會變得非常分歧與多元,所謂治絲益棼,莫此為甚了。因此,慢性犯罪者的概念事實上有其複雜性和困難性,而未被一般犯罪學者或政策制定者所察覺。慢性犯罪者是否需有特殊的原因理論或政策處方?這是我們需要深思的。

(二)慢性犯罪者精準預測工具的缺乏

如果有「慢性犯罪者」之存在,我們必須要等到他們 完成犯罪生涯了,才能找得到他們,但此時他們已接近從

犯罪生涯退休了。在還沒有成為慢性犯罪者之前,我們如何能找到他們呢?是否具備準確的預測工具?

如Zara和Farrington(2016)指出,刑事司法體系的工作者,對風險評估(或預測)有著矛盾情結(ambivalent):一方面,刑事司法體系的各個決定(如逮捕、保釋、判決、假釋等)充滿了風險評估,也是最需要專業能力者;但另一方面,又擔心評估(預測)的誤差及其所造成的後果。因此,刑事司法非常需要精準的評估工具之協助。但即使如此,統計而言,完全精準無誤差的評估工具仍常是可望而不可及。

研究生命歷程中犯罪行為或犯罪人的異質性多半使用 群組化發展軌跡分析(group-based analysis of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該分析模組假定人口總體是由有限量的群 組所組成,可透過各項指標將個人依其發展軌跡予以分類 (Nagin, 2016)。然而,該統計分析方法受到一系列的質 疑(Eggleston et al., 2004; Skardhamar, 2010)。基本上, 批評聚焦於群組分類乃是統計分析的人為產物(artifactual product),也就是說,即使現實中不存在這樣的群體,透 過群組化模型建構,依然可以在數據資料中識別出顯著特 性的群體;再者,分析的資料性質大大地影響研究結果, 例如追蹤的期間、暴露於犯罪機會的時間(亦即在社會上 的時間)、和死亡的時間點等因素,對於分析高犯罪率形 態尤其重要(Eggleston et al., 2004)。但現有的慢性犯罪者 預測結果之堅實度(robustness)與敏感度(sensitivity)分 析研究尚嫌不足,因此,若社會政策制定立基於不確定的 研究證據,帶來的嚴重後果將無以估計。

(三)長期監禁犯罪最高點的青少年犯之倫理問題

長期監禁慢性犯罪者的時機應是在「犯罪最高點」之前,根據一般的年齡一犯罪曲線約在15-17歲左右(Gottfredson & Hirschi, 2020, pp. 9-10),或較晚一些約在18-20歲左右(參閱圖2),但這顯然威脅到隔離主義,因它建議為了犯罪預防的利益而監禁青少年犯罪者。在缺少精準預測工具的前提下,長期監禁預測將來有可能會成為慢性犯罪者之青少年犯,顯然將會引發嚴重的研究與政策倫理問題。

(四)慢性犯罪者之概念效度(conceptual validity)仍未 建立,研究指出,低自我控制可成為慢性犯之替代 概念

Piquero(2007)等人以Gottfredson和Hirschi(1990) 之自我控制理論測試慢性犯罪者之各層面概念(如慢性犯 罪者之盛行率、犯罪頻率、犯罪嚴重性、犯罪期間及犯罪 中止等),發現自我控制理論得到全然支持,而研究資料 與慢性犯罪者論點顯有背道而馳。主張慢性犯罪論者如 Blumstein等人(1986)提出觀點認為,活躍的生涯犯罪人 (active career criminal)其盛行率(prevalence)、犯罪 頻率(frequency)、犯罪持續性(persistence)、犯罪嚴 重性(seriousness)、生涯期間(career duration)及犯罪

中止(desistance)等之相關因素及原因均可能不相同,須個別研究探討。相反地,Gottfredson和Hirschi(1990)不僅質疑「生涯犯罪」概念之必要性,因缺少足夠證據,他們的自我控制理論亦主張,無論慢性犯罪者犯罪多少次,犯罪行為有相同的原因。該理論亦主張,導致個人犯罪的穩定特徵並不會產生穩定的犯罪行為。換言之,Gottfredson和Hirschi認為,低自我控制應會與犯罪生涯之各項參數(parameter,如:盛行率、犯罪頻率、犯罪持續性、犯罪嚴重性及生涯期間等)相似或相等相關,並無顯著差異可言。但生涯犯罪觀點則認為,各項參數的相關因素與原因可有不同。

Piquero等人(2007)收集紐西蘭Dunedin Multidisciplinary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Study,共985名自3歲至26歲樣本追蹤調查資料,檢驗自我控制理論和生涯犯罪各層面間之關係,包括參與、次數、持續和中止等之相關關係。結果發現,自我控制與犯罪參與(包括全體樣本、少年與成年樣本)、犯罪次數和犯罪中止等均顯著相關,且能明顯區別中止犯(有較高自我控制)與持續犯(有較低自我控制)。自我控制理論得到實證資料較多的支持。顯然,生涯犯罪的概念仍缺少證據的支持。

(五)慢性犯罪者概念問題小結

綜合以上慢性犯或習慣犯等概念問題的敘述可發現, 如果我們太過於強調慢性犯罪者的概念,事實上會限制了 我們對犯罪問題的思考,而且易於不斷重複此一炫麗吸引 人的名詞和口號,對於犯罪預防政策反而易陷入單一化。 這樣的思考須是對此概念有相當的效度,且其他概念的效 度較低,但事實並非如此。

早在1986年⁴, Gottfredson和Hirschi (pp. 231-232) 即指出,犯罪與事業(或慢性犯罪者、習慣犯等)是互相 對立的概念(antithetical)。他們指出,自從啟蒙時期以 來,古典犯罪學的先賢們即已主張,國家的存在部分理由 是要預防犯罪。而在自由民主社會,國家是以法律刑罰和 監禁矯治來預防處遇犯罪。但古典犯罪學並沒有主張僅有 少數慢性犯罪者犯罪的說法(或僅有少數人有犯罪性, criminality),而是主張多數人均有犯罪的傾向,都有犯 罪的可能,且認為犯罪是在缺乏約制(或刑罰約制, sanction)的情況下會發生。犯罪因此是自然、缺少技術 及缺少約制的活動或行為,是一種缺少或忽略社會及長遠 後果的活動。犯罪人因此是相當不關注自己行為後果的 人,較依自己的衝動而行為。犯罪人因此較短見、追求立 即快樂,也較缺乏社交技巧,對於處理好日常的事務相對 困難。這樣的犯罪人較難追尋一般意義下的「犯罪事業」 或長久地犯罪。而Laub和Sampson(2003)的犯罪生命史 研究也指出,當所謂的持續犯罪者在犯罪晚期被逮捕到 時,大部分都是罪刑輕微的公共秩序犯罪(如酒醉、破壞 等),說明他們常是社會的失敗者,而非成功者,且自我

⁴ Gottfredson和Hirschi在2020年出版的Modern control theory and the limits of criminal justice一書裡,亦有相類似的論點 (pp. 151-162)。

隔離、邊緣化,無須社會的強力干預。相反地,可能更需 社會協助其生活和健康問題了。

三、慢性犯罪者實證問題之臺灣資料檢視:資料顯示,年齡對犯罪的影響強大

依照慢性犯罪者的概念,犯罪將不受年齡影響,慢性犯罪者終其一生的「犯罪事業」都是很活躍的(active),且一直持續其犯罪行為而不會下降。現在我們以臺灣的年齡與犯罪關係資料來檢驗此一假設。

如果慢性犯罪者存在的話,針對犯罪人的追蹤調查,可以發現年齡—犯罪曲線平滑化,因犯罪不隨年齡而下降。但針對犯罪人的追蹤調查結果顯示出,年齡的效應明顯,犯罪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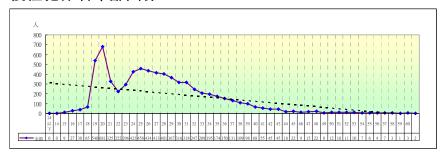
(一)石玉華(2011)為瞭解臺灣少數人(慢性犯罪者)犯多數罪的狀況,分析1991年單一次犯罪被判刑確定有罪者,共86,671人,追蹤至2010年底止,在19年期間其所有的犯罪案件且被判決確定有罪者,從其人口特性及犯罪情形,探討慢性犯罪者的特徵及再犯期程。

結果發現,1991年裁判確定有罪初犯者86,671人中,在19年期間只有單一次犯罪者計有53,587人,占86,671人的61.8%,有2至4次裁判確定有罪案件者(偶發犯罪者),計有26,009人占30.0%,有5次以上裁判確定有罪案件者(屬於慢性犯罪者),僅有7,075人占8.2%。慢性犯罪者7,075人,在19年期間所有裁犯確定有罪案件共計54,175次。犯罪人數7,075人占所有裁犯確定有罪案件

86,671人的8.2%,累計其裁判確定有罪案件54,175次,占 所有裁判確定有罪案件173,754次的31.2%,也就是8.2%的 慢性犯罪者,犯了31.2%的罪行。

其次,就慢性犯罪者(即7,075人)各個單一年齡別的人數統計,犯罪年齡為19-20歲為高峰期,人數介於540-700人之間,21-22歲突然下降到300人不到,研判應是服兵役致人數減少,到了24-25歲又呈現另一次高峰,人數介於420-460人之間,26-31歲呈現一個略顯平滑的次高峰期,介於316-413人間,32-38歲介於100-249人之間,50歲以後的各個年齡的慢性犯罪者,則只有個位數10人不到。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性犯罪者呈減少趨勢(如圖2所示)。即使分別男女性,其年齡與犯罪關係亦無大變化。因此,年齡對犯罪有很大的影響力,犯罪在19-20達到高峰,然後急遽下降,雖然在22-23歲有另一次高峰,但之後犯罪即一直下降,至45歲以後已很少犯罪人了。此與慢性犯罪者之假設顯然不符。

圖2 慢性犯罪者年齡曲線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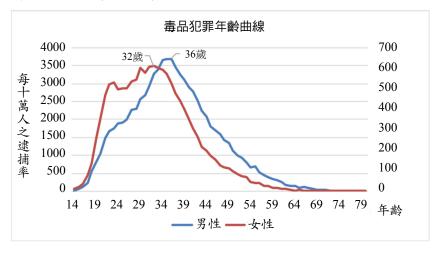


(二)毒品施用者之年齡與犯罪曲線亦顯示,年齡影響力顯著。許春金等(2018)獲刑事警察局提供2009年11月1日至2016年7月29日12類破獲犯罪類型數據,包括殺人、強盜、搶奪、竊盜、汽車竊盜、機車竊盜、性侵害(含強制性交、共強性交、和對未滿14歲男女性交)、毒品(含施用一二級毒品、販賣轉讓毒品、持有毒品、運輸毒品、和其他毒品犯罪行為)、詐欺、洗錢、人口販賣、組織犯罪,共276,707犯罪嫌疑人,650,552案件數,其中毒品犯計136,118人,其中再犯者80,562人,而限於毒品再犯者為70,464人,全部毒品犯共犯下402,164件犯罪。其中325,511件(80.9%)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常習犯或慢性犯罪者(被逮捕5次以上者)計33,115人,共犯下271,236件犯罪。如圖3所示,毒品犯罪年齡曲線再區分男

⁵ 資料來源:石玉華,慢性犯罪者及其犯罪特徵之探討,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圖4-1-1。

性(150,897有效案件)與女性(24,431有效案件)⁶。整體而言,男性與女性毒品犯罪的高峰期均落在30-40歲間,男性最高峰為36歲,每十萬人有約3,682人犯毒品罪,女性最高峰為32歲,每十萬人有約610人犯毒品罪。圖3很明顯地顯示,雖然毒品犯罪至30歲後期才開始急遽下降,但年齡對毒品犯罪亦有顯著影響,至50歲以後毒品犯已降至很低,毒品犯也有中止犯罪的時機。

圖3 毒品犯罪之年齡分布(性別分)⁷



⁶ 因為資料的整合與串接,產生缺失值,所以毒品犯罪年齡曲線的繪製僅剩175,328件有效案件。詳細描述請參閱許春金、蔡田木、黃俊能、陳玉書、郭佩棻、孟維德、黃翠紋,《臺灣地區犯罪、常習犯、及跨境化趨勢與防制之巨量資料研究》(MOST 105-2634-H-305-001),科技部期末報告,2018年,pp.105。

⁷ 資料來源:許春金等,同前註,圖5-3-1-2。

四、臺灣資料之檢視小結

犯罪難用「事業」加以比擬,大部分犯罪者也難具有事業者之基本特性,如須有訓練(disciplined)、須努力學習特殊專長、需有耐心、準時、不斷精進自己等。最重要的是社會難以鼓勵犯罪行為,卻可鼓勵職業化的高尚行為,因此,隨著年齡增長,犯罪行為也會不持久地逐漸消散而減少。臺灣資料不斷提醒我們,所謂慢性犯罪者或持續性的犯罪人是很少的,甚或可忽略。從人性觀點而言,人較願意被讚許、認同而融入群體,這與慢性犯罪者或持續犯罪者之概念豈不背道而馳?

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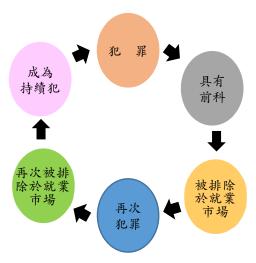
有效的犯罪防制政策立基於明確及證實的理論概念, 先且不論慢性犯罪者的理論基礎是否受到充分的驗證(由 上所述顯然尚未),依其概念發展的長期隔離刑處遇政策 已經面臨嚴峻的考驗,尤其是監獄擁擠和人口老化等現 象,增加監獄管理與受刑人教化效果之挑戰,對於矯治資 源造成巨大而失衡的壓力,並容易引發監獄環境和政策層 面等相關問題(Rikard & Rosenberg, 2007)。

此外,習慣犯或慢性犯法律並不能有效地捕捉到嚴重的慢性犯罪者,根據習慣犯法規被判刑的罪犯與根據其他法規被判刑的罪犯之間的差異不大(Sigler & Culliver, 1990);再者,長期隔離刑並沒有帶來預期的犯罪抑制成

效。以三振法案為例,Chen (2008)分析1986-2005年間,加州和美國其餘49州的犯罪變化發現,相對較為強力且全面執行三振法案的加州,其犯罪率下降效果並沒有比其餘各州來得顯著,然而預算已見絀的加州卻仍然必須實施昂貴的三振法案政策,以致不得不大幅削減基本教育、州立大學、弱勢者補助、以及提前釋放受刑人等之開支。若能限縮執行三振法案,每年便能騰出數百萬美元用於提供全美人口最多的加州民眾各種福利及服務。

近半世紀以來,在英美法系國家,犯罪人的犯罪歷史 是最重要的量刑考慮因素,僅次於犯罪的嚴重性,其重要 性可能甚至意味著小額罰金或多年監禁之間的差別。然 而,在大多數的犯罪人不是初犯,以致累再犯被不斷加重 刑罰之狀況下,造成監獄人滿為患,加上在這樣的程序 中,於量刑法理學和社會利益的衡量下,都無法對於嚴懲 累再犯的刑罰制度提供合理的理由,因此促使各式的刑事 司法政策反思,加速發展補充或替代方案,以打破犯罪前 科及其附加不利後果之惡性循環(圖4)。以下就近年美 國重要的幾項制度方案提供簡單的介紹。

圖4 犯罪前科及其附加不利後果之惡性循環



一、第二次機會法案® (The Second Chance Act)

第二次機會法案是聯邦法案,也是美國國會於2008年 通過第一個有關受刑人之社會復歸法案,並且獲得兩黨的 支持及廣大刑事司法領導人(包括:警政、矯治及法院 等)甚而健康工作人員等的廣泛支持。該法是美國聯邦政 府所提出是類第一項法案,可說是代表美國聯邦政府對降 低再犯與增強公共安全,同時降低聯邦及州政府矯治成本 的一項努力。研究不斷指出,除少數例外,幾乎所有受刑

相關資料整理摘自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Second Chance Act, Face Sheet (2018). https://csgjustice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July-2018_SCA_factsheet.pdf (last visited: July 19, 2022).

人遲早都會被釋放而回到社會。但是返回社會後,他們會面臨許多不同的嚴峻挑戰,包括:心理精神健康、毒品及藥物濫用、居住問題或無家可歸、教育與就業問題、家庭相處及兒女問題等,不一而足。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二次機會法案鼓勵並贊助各級政府及非營利組織、原住民社區等機構,提出各項創意方案能協助受監禁之成人及青少年復歸社會。

截至2018年底,司法部共計贊助了840項以上計畫, 164,000出獄受刑人參與各式各樣復歸計畫,包括:就業訓練、毒品戒癮、教育、家庭諮商、居住及被害支持等。統計也發現,自2011年起至2018年底,第二次機會法案至少幫助12,000人就業。

以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的連接計畫(The Connection)而言,提供由矯治單位或法院單位轉介而來的出獄受刑人短期居住、同儕諮詢、個案管理等服務。他們會協助個案逐漸發展出個人化的復歸和處遇計畫,目標是協助個案獲得穩定的居住、就業和最終與社區融合。

又以德州的少年司法局(Texas Juvenile Justice Department)所執行的第二次機會方案而言,提供13-19歲有幫派背景之青少年出獄後,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復歸服務。透過進案時的評估,根據其個別需求,該局提供完整的個案輔導。根據最近的研究發現,參與方案的青少年,20週以後的再被逮捕率有20%,而對照組則有30%。

二、工作申請資料,禁止詢問犯罪紀錄(Ban-the-Box)

因為過去的犯罪經驗與未來的犯罪機率存在著高度關聯(Nagin & Paternoster, 2000),所以一旦犯了罪,犯罪人於各個面向上就不同於非犯罪人了,舉例來說,法律層面上,累再犯加重量刑;經濟層面上,雇主可透過背景調查,排除有犯罪前科的申請人;相似地,教育層面上,學校亦可透過背景調查,拒絕有前科紀錄者的入學申請(Kirk & Sampson, 2013)。這種因前科紀錄造成難以復歸社會的各項障礙,迫使他們不得不再次犯罪,自然成為持續犯。

Piquero(2004, p. 105)指出,若一個人追求經濟或其他目標的手段,從違法的方式轉變為合法方式的話,那麼犯罪行為自然可被中斷;亦如Sampson和Laub(1993, p. 8)描述的人生轉捩點(turning points),學校、家庭、工作可改變生活軌跡和重導人生的路徑,尤其獲得合法就業的能力和機會是犯罪人成功重新融入社會的關鍵之一(Henry & Jacobs, 2007; Pager, 2006)。然而,研究一再證實前科犯因為犯罪紀錄造成難以找到滿意的工作(Decker et al., 2015; Pager, 2007; Schwartz & Skolnick, 1962),對於黑人的影響尤其嚴重(Pager, 2003; Uggen et al., 2014)。即使有研究發現微罪逮捕紀錄對就業機會的影響力不如監禁紀錄影響力那麼大,但是它仍顯現出,即使是非常輕微的犯罪紀錄也存在著污名與歧視的作用力(Pager, 2003)。

有鑑於犯罪紀錄嚴重有害前科犯找到工作,加上電子數據庫的出現使得背景調查變得更為容易及廣泛,美國學界與政府開始發現大規模的監禁政策(mass incarceration)逐漸惡化與擴大社會階級情況,刑事司法處遇使弱勢族群更為弱勢,因此,政府不斷實施許多針對協助更生人經濟問題的社會復歸計畫,例如收入支持(income support)和過渡性工作(transitional employment)等方案,皆期待透過短期的政府補助增進更生人的就業前景。不過,成效評估研究結果並不盡理想。現實是整體就業市場對於前科犯仍是不友善,根據2003年加州商業機構調查資料(2003 Survey of California Establishments)的分析結果發現,高達71%的雇主表示可能或絕對不會聘僱有犯罪前科的人,加上72%的雇主表示他們會調查申請者是否有犯罪紀錄,因而犯罪前科使得找工作困難、薪水較低或是只能從事低階勞力且沒什麼升遷機會的工作(Raphael, 2011)。

為使前科犯避免在篩選的第一階段就因為其犯罪紀錄而落選,失去在招聘過程中充分展現他們的能力與資格的機會,美國為前科犯倡議者發起一項運動,名為Ban-the-Box(BTB),意旨取消在工作招聘申請程序中詢問申請人是否有犯罪紀錄的選擇框。夏威夷在1998年成為全美第一個通過Ban-the-Box法律的州,該法律至今仍然被認為是美國最健全的法律之一,它禁止政府和私人雇主在提供有條件的就業機會之前進行犯罪紀錄調查,但某些類別的工作不在此限,如醫療保健和安全相關的工作。政策評估研

究指出,Ban-the-Box法律有效地降低夏威夷首都檀香山(Honolulu)的再犯率,在該法律實施後,因重罪被起訴的刑事被告擁有定罪前科紀錄的機率降低了57%(D'Alessio et al., 2015)。

截至2021年10月,全美已經有37個州和150個城市以上實施Ban-the-Box法律,又名公平機會法(Fair Chance Act),藉由從工作申請中刪除定罪和逮捕紀錄問題,並將背景調查延遲到招聘程序後期,為申請者提供了公平的就業機會。近年來,對公平機會政策的支持力道強勁,不僅州和地方各級政府都採用了,聯邦政府也實施了這些政策,例如,2015年11月,歐巴馬總統通過指示聯邦機構將求職者的紀錄查詢延遲至招聘程序的後期,從而批准了Ban-the-Box法律;2019年11月,《2019年公平競爭工作機會法》(Fair Chance to Compete for Jobs Act of 2019)成為《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的一部分,自2021年12月起,該法律將禁止大多數聯邦機構和承包商要求提供有關求職者被逮捕和定罪紀錄資料,直到已經有條件地提供工作給求職者(Avery & Lu, 2021)。

除了公家機關工作之外,將公平機會政策擴展到私營機構是確保有犯罪紀錄的人在大多數工作中獲得公平就業機會的關鍵一步,許多州和地方政府已經落實Ban-the-Box法到政府承包商和私營雇主。目前已經有15個州和22個城市將其當地公平機會招聘法擴展到其管轄範圍內的私人雇

主;華府特區(The District of Columbia)和37個城市亦將公平機會招聘政策擴大到政府承包商。將實施公平機會法或政策的州及地方人口統計起來,全美有超過2.67億人(美國總人口的五分之四以上)生活在某種形式的Banthe-Box政策之管轄區域(Avery & Lu, 2021)。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Ban-the-Box政策仍然允許雇 主在工作招募程序後期進行犯罪背景調查,因此產生一些 未料到的負面結果,包括雇主為節省招募成本,以及避免 因僱用了於工作期間再犯的前科犯而被控告有招募疏忽的 可能性,憑藉統計數據上的刻板印象認為,年輕低技能的 少數民族(非裔或西班牙裔)男性有較高的機率有犯罪前 科,所以一開始就傾向淘汰這類人的申請,反而加大了種 族歧視,對於有前科者的工作機會並沒有產生助益,甚至 有害(Doleac, 2019)。然而, Craigie (2019)分析2005-2015年的全國青年縱貫調查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資料發現, Ban-the-Box政策將有定罪前 科者的公共就業機率平均提高了大約30%,目並無發現該 政策有增加對於年輕低技能少數族裔男性的統計歧視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此外,Ban-the-Box政策使 高犯罪率社區居民的就業率增加了4% (Shoag & Veuger, 2021) 。

三、前科紀錄自動消除制度(Automatic Criminal Record Expungement)

前科犯比起一般人找工作的難度更高(Pogarsky,

2006;鄭元皓等,2021),許多雇主不願意僱用前科犯大多基於認為前科犯再犯的機率高,因此為了客戶及其他員工的安全、公司的聲譽、避免官司和降低工作場域發生糾紛等原因,而降低僱用前科犯的機會。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雖然前科紀錄確實會增加再犯的機率,不過這樣的關聯會隨著與前次犯罪時間的間隔而下降,也就是說,前犯發生的時間愈久,再犯的機率愈低(Kurlychek, et al., 2006, 2007; Raskin, 1987; Schmidt & Witte, 1988)。

因此,為避免雇主因後續仍可以進行背景調查而影響 其一開始的篩選決定,另一更實質地消弭前科紀錄對於工 作形成的障礙之策略為「消除和封緘犯罪紀錄」 (Expunging and Sealing Criminal Records)。原則上,真 正的「消除」(expungement) 意指從國家法律紀錄上刪 除了紀錄,「封緘」(Sealing)則是為某些有限的國家目 的(如對未來犯罪的偵查)保留紀錄,但不得公開。前科 犯在一定的期間不犯罪之後,其再犯的風險與一般人幾近 無異 (Blumstein & Nakamura, 2009; Kurlychek et al., 2006, 2007) ,那麼他們的犯罪紀錄不應該再是給予工作與否的 考量因素之一。迄今,將近有40個州實施某種形式的「消 除法律」(expungement laws),通常授予前科犯申請工 作、租屋、學校和社會福利等權利,就似他們的犯罪紀錄 不存在一樣,掃除因犯罪前科導致的各種法律與社會經濟 之不利後果。許多州政府最近已通過,或目前正在考慮新 的「消除法律」或擴展現有的制度(Love & Schlussel, 2020a),例如,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2019年首次通過請願制犯罪紀錄消除程序法律(a petition-based expungement process)(Jarrett et al., 2019);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德拉瓦州(Delaware)、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和科羅拉多州(Colorado)對於請願系統也進行了顯著的改變,將救濟資格(eligibility for relief)擴大到一系列非定罪及定罪紀錄,包括重罪(felony-level offenses)。其中,新墨西哥與北達科他州是上述這些州中最先授權封緘成人犯罪紀錄,大部分的重罪紀錄也都提供救濟,但申請人必須支付申請費用,並在法庭聽證會上提出救濟途徑(如果檢察官同意,北達科他州法院可以免除聽證會)(Love & Schlussel, 2020a)。

2021年7月,曾是美國唯一法院和紀錄統計處無權密封非定罪紀錄的亞利桑納州(Arizona)也通過了授權法院就前科犯之請願可封緘其定罪與非定罪紀錄,該法將於2023年1月1日生效後成為適用範圍最廣泛的立法之一,除了一級重罪和某些暴力及性犯罪之外,其他犯罪紀錄幾乎都在經過無再犯一段時間後,犯罪人就可以請願消除,時間的長短取決於罪行嚴重度,例如,第2級和第3級重罪在刑滿出獄後10年可以提出請願,第4、5和6級重罪需要5年,第1級微罪需要3年,更微罪的則只需要2年,且多筆符合條件的定罪可以在單項程序中或按照順序封緘。另外,亞利桑納州規定,在一開始量刑時,法院必須以書面通知被告,將來若是符合條件,他可以向法院請願密封所

有案件紀錄,鼓勵犯罪人改過自新(Collateral Consequence Resource Center, 2021)。

然而,許多符合資格的人並沒有消除他們的犯罪紀 錄,因為申請的程序可能既昂貴又複雜,J. J. Prescott和 Sonja Starr兩位密西根大學法學教授在2020年的一項研究 估計發現,2004年至2011年間,密西根州90%以上符合資 格的人沒有申請,在所有符合資格的人中,只有6.5%的人 在他們第一次有資格消除紀錄之日起算5年內取得紀錄消 除(Prescott & Starr, 2020)。因此,許多州正試圖通過 「前科紀錄自動消除」法律來減輕程序負擔,讓符合資格 的人不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2018年,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成為第一個採行自動消除成人刑事定罪 制度的州政府,對於10年持續無再犯的非暴力微罪前科 犯,其犯罪紀錄自動封緘⁹(Karimi, 2019);2019年,猶 他州(Utah)、紐澤西州(New Jersey)和加州 (California)也頒布了自動消除法令,在某些規定更加開 放,例如,猶他州規定第3級微罪紀錄只要犯罪人5年無再 犯就自動消除10 (Miller, 2019);加州對於全部得處以假 釋的犯罪(即便是重罪)規定,一旦假釋期間屆滿,紀錄 就立即自動消除,不過該規定只適用於2021年1月1日起之

⁹ 重罪前科,如暴力犯罪、性侵害、殺人及兒童危害等相關罪刑,不包括在自動封緘內。

¹⁰ 第2級微罪等待時間需要6年,持有毒品罪需要7年。

定罪¹¹;紐澤西州則是將自動消除法律擴展適用於一些重罪和微罪,只要在10年內沒有再定罪,對消除的定罪前科數量沒有限制¹²。迄至2021年11月,全美一共有21州通過前科紀錄自動消除法律,雖然各州之適用內容及規定有些許差異¹³,不過這樣的制度似乎會是未來其他各州仿效的趨勢。

四、第一步法案¹⁴ (First Step Act)

2018年12月,美國總統川普(Trump)簽署了第一步 法案(First Step Act)。該法案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共同 為提升改善刑事司法結果及降低聯邦監獄受刑人數,同時 亦能維繫公共安全,而共同支持通過的法案。該法案可說 是廣泛的刑事司法革新,以協助監獄受刑人之社會復歸為 基本著眼點。

第一步法案最重要目標是要降低再犯。為了達成此目標,該法案規定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應發展一套聯邦受刑人再犯風險與復歸需求的工具,供監獄矯治人員

¹¹ California Penal Code § 1203.425(a)(2)(E). 自動消除制度也適用於處以 監禁的所有微罪,但需等待1年。

¹² New Jersey Statute § 2C: 52-5.4

¹³ 参閱50-State Comparison: Expungement, Sealing & Other Record Relief, (Oct. 2021), https://ccresourcecenter.org/state-restoration-profiles/50-state-comparisonjudicial-expungement-sealing-and-set-aside/ (last visited: Feb. 13, 2022).

¹⁴ 摘要整理自Federal Bureau of Pris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irst Step Act of 2018: An Overview* (March 4, 2019),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558 (last visited: June 4, 2022).

使用,以便能合適的分類受刑人至不同團體以參與合適的 再犯降低方案,是為復歸社會的第一步。

監獄當局也要協助受刑人申請各項證明文件,包括社 會安全卡、駕駛執照,或其他有相片之官方文件及出生證 明等。

第一步法案也擴充了第二次機會法案(The Second Chance Act)的授權範圍,讓監獄和社區機構能與非營利或私人機構(包括宗教團體等),共同結盟合作提供再犯降低方案。為了鼓勵受刑人早日回歸社會,該法也給予聯邦監獄受刑人,其宣告刑(imposed sentence)每年最高之縮刑(good time credit)為54天。例如,如果被宣告10年有期徒刑,則其最高縮刑為540天。但此項激勵措施不適用於暴力犯罪受刑人,如:恐怖主義活動、人口販運、性剝削,以及武器或高階毒品犯罪之再犯者。

為了讓受刑人能與家庭聯繫更為密切,該法也要求監 獄當局依據監獄床鋪的空間需求、受刑人的安全需求、復 歸方案需求、心理與醫療健康需求甚至於受刑人的宗教信 仰需求及法院的建議等,其服刑監獄距住家500哩以內。

其他的矯治革新包括:不得對服刑中的孕婦使用強制力量、監獄應提供衛生棉及符合健康照護需求的衛生紙巾、應提供矯治人員如何降低監獄內衝突的訓練、禁止單獨拘禁青少年犯等。

五、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Deferred Adjudication of Guilt)

為避免定罪紀錄產生的後續各項附帶的不利後果,前 不過在刑事司法前端轉移個人定罪判決亦同時漸漸受到關 注,例如「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Deferred adjudication)制度。有別於一般檢察機關的緩起訴制度, 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制度是法院職權,在典型的情況 下,法院接受被告的認罪,但保留定罪與判決,取決於後 續被告是否滿足一段時期的附帶條件緩刑,如果被告成功 完成緩刑,法院會駁回起訴目撤銷認罪答辯,以便被告可 稱其從未被定罪15。在許多司法管轄區,如果是依據被告 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制度之程序成功完成的緩刑,該紀錄 就會被消除(expunged)或封緘(sealed),因此就不會 有公開的證據可表明這人曾被指控犯罪,且不似前科紀錄 消除的做法—從紀錄中移除已存在的定罪所行的法律程 序,完成附帶條件的暫緩定罪被告是從未在法律上被定 罪。再者,對於被告來說,如果他們能夠遵守完成法院的

¹⁵ 根據許多司法管轄區之法律規定,直到刑期宣判和作出判決前,沒有所謂的「定罪」(conviction)。例如依照阿肯色州(Arkansas)的規定,一個人在被判處監禁或罰金之前不被視為定罪,所以僅判處緩刑並不能構成定罪。臺灣的緩刑不同,依刑法第74條規定,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屬於初犯條件,且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因此在臺灣,緩刑的前提是已經有定罪。

命令,那麼就幾乎可省去之後繁瑣和昂貴的紀錄消除請願程序及法律規定的等待期間(Love, 2009)。

對於「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制度施行辦法,各州有不一樣的細節規定。基本上,許多州規定,只有被控相對較輕微的犯罪,或前科是較輕微的犯罪之被告,才有資格獲得「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處分,通常涉及性和暴力相關之犯罪類型均排除在外,給予的緩刑期通常為1-2年,但有些州可能長達5年。大多數州規定,每位被告只有一次機會獲得「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處分(Love, 2009)。舉例來說,早在阿肯色州(Arkansas)1975年的初犯法(First Offender of Act)即規定,認罪或不爭辯的初犯可能獲得「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處分,並且在成功完成緩刑後自動擁有消除(或封緘)該紀錄之權利,但是涉及與18歲以下被害者發生性犯罪的被告不適用¹⁶;1989年通過的對於首次毒品犯處遇法案亦有相似的規定,提供給未曾因毒品犯罪被定罪的被告一次「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處分的機會¹⁷。

迄至2020年,全美僅剩2州(堪薩斯州和威斯康辛州)尚未授權其法院在任何涉及刑事起訴案件使用「被告

Ark. Code. Ann. §§ 16-93-302(a)(1), 16-93-303(a)(1). 1993年阿肯色州通過社區處罰法(Community Punishment Act),緩刑不限於初犯,只要不是犯下任何嚴重暴力罪行或是已經有兩項(含)以上重罪前科的被告,都有資格可能獲得緩刑,但是這樣的緩刑處分,在受處分人成功完成緩刑及其附帶的條件後,並不自動擁有紀錄消除權利,必須向法院提出請願,而法院可同意或拒絕。

¹⁷ Ark. Code Ann. § 5-64-413.

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處分。這些年來,各州擴大了法院 「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處置之權限,並在成功完成 後更普遍地實施紀錄封緘,一些州甚至取消認罪規定,以 避免認罪處置可能引發聯邦法附帶後果¹⁸。

綜合而言,各州對於「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授權範圍大致可分為三大類別,第一類屬於廣泛可行使「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處分,在許多允許緩刑之犯罪案件且得不考慮前科之情況,法院(某些州還有檢察官)可根據具體情況認定給予「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處分之適當性¹⁹;第二類的區別在於根據起訴罪行或前科紀錄對於「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資格有不同限制,以及許多州限制紀錄消除救濟相關規定,例如此類中僅有佛羅里達州(Florida)和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允許法院有重罪前科紀錄者具「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資格,但是限制紀錄封緘,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和德拉瓦州(Delaware)則僅授權輕微罪行具「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資格²⁰;第三類為只在特殊案件授權「被告

¹⁸ 某些聯邦法律和政策,如移民法,將「被告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要件之認罪協商視為定罪,即使法院從未作出定罪判決。例如參閱Or. Rev. Stat. § 475.245 (排除認罪規定,避免依據8 U.S.C. § 1101(a)(48)執行驅逐出境命令)。

¹⁹ 計有18州:Alabama, Colorado, Idaho, Massachusetts, Maryland, Maine, Mississippi, Missouri, Nebraska, New Mexico, New York, North Dakota, Rhode Island, Texas, Utah, Vermont, Washington, and West Virginia.

²⁰ 計有17州:Alaska, Arkansas, Delaware,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owa, Kentucky, Louisiana, Montana, Oklahoma, Pennsylvania, South Carolina, South Dakota, Tennessee and Wyoming.

認罪但法院暫緩定罪」,通常是無前科者之毒品案件²¹。

肆、結論與討論

雖然,犯罪學很早即發現有犯罪集中性的證據,但一直到最近才有系統性、科學性的研究。對於以集中性現象發展出之長期隔離刑刑事政策,亦開始出現許多討論,質疑與改革的聲音愈趨熱烈,故我們應適時予以關注,切實地審視長期隔離刑政策是否真能發揮預期效果,以及是否有足夠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工具設計。總結來說,以下三項論點為本文主要呈現的思考觀點。

一、雖然犯罪的集中性現象是非常重要值得關注的議題,但本文指出慢性犯罪或習慣犯之概念效度仍 薄弱,因之而發展的長期隔離刑亦引發社會正 義、監獄擁擠及合適的社會復歸議題

雖然犯罪有集中現象,少數人犯了相當多數犯罪,少數地方也發生相當多數犯罪事件,少數被害者也發生了相當多數的被害事件(許春金等,2018;許春金等,2021; Weisburd, 2015; Farrell, 2015)。但這並不意味為了公共

²¹ 計有13州: Arizona, California, Connecticut, Indiana, Michigan, Minnesota, Nevada, New Hampshire, New Jersey, North Carolina, Ohio, Oregon, Virginia,以及華盛頓特區和聯邦系統。各州詳細規定請參閱M. Love & D. Schlussel, *The Many Roads to Reintegration: A 50-State Report on Laws Restoring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after Arrest or Conviction*,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Resource Center (2020b).

安全的理由,這少數犯罪人(即慢性犯罪者或習慣犯)應 受到長期隔離刑的嚴厲刑罰。這不僅有少數人乘載多數刑 罰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議題,也有監獄擁擠與社 會復歸的刑事司法實際能量問題。

本文發現,近代社會對長期隔離刑的關注和政治吸引,主要源自1972年Wolfgang等人對慢性犯或習慣犯的研究發現。本文也發現,慢性犯或習慣犯缺乏概念效度,長期監禁尚未完成犯罪生涯且仍在犯罪最高點的少年犯有相當的政策倫理議題,而更重要的是我們仍缺乏精準的犯罪預測工具,難以精準無誤地預測何人未來可成生涯犯罪人。不僅如此,實證資料也發現,即使是慢性犯也會隨著年齡增長有逐漸減少的現象,長期隔離顯無必要。本文因此也主張,我們應從慢性犯罪之長期隔離刑狹窄之犯罪防治焦點中解放,即慢性犯亦可復歸社會,終其一生均是慢性犯罪者應是絕無僅有。而且,大部分慢性犯罪者均會復歸社會,太早長期隔離他們於社會之外,也扼殺了他們復歸社會的想望與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不宜讓慢性犯罪者的概念限制了我們對整體犯罪問題的思考,忽略了犯罪都是一種人類的可能。

為了減緩犯罪集中或慢性犯之形成問題,本文也主張,我們應可借鏡美國近代社會復歸法案,為廣大的犯罪 人或受刑人之復歸社會開啟機會之窗。

二、美國本世紀以來的各式社會復歸法案或策略,深 值我國研究作爲協助受刑人社會復歸、減緩犯罪 集中性及高累再犯之對策

1980-1990年代,美國盛行嚴刑峻罰(tough on crime)刑事策略,大量採行定罪與長期監禁等懲罰性處 遇,造成過多的美國人有前科紀錄。據統計至2010年代, 大約1,900萬至2,400萬美國人有重罪定罪紀錄,占成年人 口比例8%以上,若加上逮捕紀錄的話,有犯罪紀錄人口數 高達7,500萬(占成年人口數的三分之一)²²(Prescott & Starr, 2020; see also Eberstadt, 2019), 其所引發的社會問 題受到各界的重視,重新思考懲罰性刑事政策 (punitive policies)的適當性,並陸續推行各項替代補充方式,積極 協助更生人順利復歸社會。本文臚列的美國近年政策革 新,包括第二次機會法案、前科消除或封存法案、禁止就 業詢問前科紀錄法案等,其建立基礎屬於從根本層面打破 更生人與社會的隔閡,努力讓犯罪人或更生人從法律及社 會資源等本質上與非犯罪人相似,有利其逐漸與社會融 合。而從一些初步的研究發現來看,犯罪得到了預防,更 生人復歸社會較為良好。

近年,為減少再犯,美國近年也不斷地從監獄或社區建立各種復歸法案,2018年川普總統簽署的兩黨刑事司法改革法案《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正式名稱為

^{22 1980}年僅有3%的成年人口有重罪定罪紀錄 (Mueller-Smith & Schnepel, 2021)。

Formerly Incarcerated Reenter Society Transformed Safely Transitioning Every Person Act) ²³亦值關注。該法案對於聯邦刑法進行了主要六大項修改,旨在改革聯邦監獄與量刑法,以減少再犯、減少聯邦監獄人數和維護公共安危;其中對於減少再犯,要求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制定一套風險和需求評估系統,供聯邦監獄局(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用於評估所有聯邦受刑人的再犯風險和需求,並將受刑人安置於減少再犯計畫和生產活動中,以滿足他們的需求並減少再犯風險。

此外,《第一步法案》還擴展了《第二次機會法案》 (Second Chance Act),由聯邦監獄局制定指南,協助典 獄長和社區型機構,與非營利組織和其他私人機構就減少 再犯計畫建立夥伴關係。

觀察臺灣現況,監所受刑人累再犯率居高不下,臺灣社會亦面臨相似的問題,對於累再犯尚缺乏有力政策工具,更生人融入社會生活仍困難重重。他山之石或可攻錯,美國對於嚴刑峻罰之刑事政策已經有許多修正及革新法案,努力修補上世紀長期刑造成的有害副作用,儘管美國近來的改革方案不見全然適用於臺灣,但是其方向與觀點值得我國參考,未來應該投注資源進行研究,尋找適合我國社會習俗與制度之有效刑事司法政策革新策略。

²³ 可參閱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558.

三、政策成效必須以科學研究方法加以評估,大量的 實證研究積累有助於釐清政策帶來的效應

以科學實證資料為依歸的政策為建立各項有效政策之必要條件,此即所謂循證(evidence-based)為基礎的政策。然而,政策實施一段時間後,規律性的政策評估研究與報告亦極為重要,這在美國政策介紹的陳述中顯然易見,政策評估研究為政府與學界均為相當重視的一環,立意良善的政策有時不一定產生預期的成效,甚至為社會帶來意外的有害結果。在臺灣,政策評估研究一直是刑事司法學術一大缺口,觀察、理論、假說、驗證等四大研究要素循環應為政策評估實證研究不斷地採行,建議未來刑事司法學者可努力從事政策評估研究,積累大量的實證資料,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提供政府政策實施成效之參考檢視依據,立法者、政策制定者及執行者可積極與學界交流討論,廣納實證研究結果,俾利政策成效受到重視。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 ➤石玉華(2011)。*慢性犯罪者及其犯罪特徵之探討*〔未出版碩士 論文〕。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https://hdl.handle.net/11296/ em38b7
- ▶李明謹(2018)。*成年假釋人犯罪生涯及其影響因素之縱貫性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https://hdl.handle.net/11296/6nvycy
- ▶許春金、呂宜芬、游伊君(2021)。犯罪集中性現象與集中性理 論之探討。軍法專刊,67(3),1-36。
- ▶許春金、蔡田木、黃俊能、陳玉書、郭佩棻、孟維德、黃翠紋 (2018)。臺灣地區犯罪、常習犯及跨境化趨勢與防制之巨量資 料研究(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期末報告,MOST 105-2634-H-305-001)。科技部。
- ▶許春金、陳玉書、賴擁連(2012)。形塑青少年中止犯與持續犯原因之縱貫性研究:整合型控制理論觀點。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15,35-65。
- ▶許春金、陳玉書、蔡田木(2014)。*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濫用與防制之研究*(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NDC-DSD-103-015)。 國家發展委員會。
- ➤葉碧翠、許春金、馬傳鎮、陳玉書(2019)。犯罪集中性與持續 犯影響因子之追蹤研究。*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32*,89-130。
- ▶鄭元皓、許茵筑、吳瑜(2021)。*毒品收容人職涯發展與社區轉 銜措施之研究*。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 ▶鄭勝天(2020)。*受觀察勒戒人終止與持續施用毒品之比較*〔未

出版博士論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https://hdl. handle.net/11296/429578

二、外文文獻

- ➤ 50-State Comparison: Expungement, Sealing & Other Record Relief (2021, October). https://ccresourcecenter.org/state-restoration-profiles/50-state-comparisonjudicial-expungement-sealing-and-set-aside/
- Avery, B., & Lu, H. (2021). Ban the box: U.S. cities, counties, and states adopt fair-chance policies to advanc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with past convictions.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 ➤ Blumstein, A., & Nakamura, K. (2009). Redemption in the presence of widespread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s. *Criminology*, 47(2), 327-359. https://doi.org/10.1111/j.1745-9125.2009.00155.x
- ➤ Blumstein, A., Cohen, J., Roth, J. A., & Visher, C. (1986). *Criminal careers and career criminals*.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8, July). The Second Chance Act. https://csgjustice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 /2020/02/July-2018_SCA_factsheet.pdf
- ➤ Chen, E. Y. (2008). Impacts of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on crime trends in California and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4(4), 345-370. https://doi.org/10.11 77/1043986208319456
- Clarke, R. V. G. (Ed.). (1997).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riminal Justice Press.
- ➤ Collateral Consequence Resource Center (2021, August 26). *Arizona* enacts its very first sealing law-and it's impressive!. https://ccresourcecenter.org/2021/08/26/arizona-enacts-its-very-first-sealing-law-and-its-impressive/
- Craigie, T. L. (2019). Ban the box, convictions, and public

- employment. *Economic Inquiry*, *58*(1), 425-445. https://doi.org/10.11 11/ecin.12837
- ➤ D'Alessio, S. J., Stolzenberg, L., & Flexon, J. L. (2015). The effect of Hawaii's ban the box law on eepeat offen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0, 336-352. https://doi.org/10.1007/s12103-014-9251-9
- Decker, S. H., Ortiz, N., Spohn, C., & Hedberg, E. (2015). Criminal stigma, race, and ethnicity: The consequences of imprisonment for employment.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3, 108-121. https://doi.org/10.1016/j.jcrimjus.2015.02.002
- ➤ Doleac, J. L. (2019, March 11).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Ban the Box policies: The state of the literature in 2019.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http://jenniferdoleac.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Doleac_testimony BTB 2019.pdf
- Eberstadt, N. (2019). America's invisible felon population: A blind spot in US national statistics.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2020 census and business uses of federal data: hearing before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 ➤ Eggleston, E. P., Laub, J. H., & Sampson, R. J. (2004). Methodological sensitivities to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long-term criminal trajectorie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0, 1-26. https://doi.org/10.1023/B:JOQC.0000016696.02763.ce
- Farrell, G. (2015). Crime concentration theory. *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7(4), 233-248. https://doi.org/10.1057/cpcs.2015.17
-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9, March

- 4). *The first step act of 2018: An overview*.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558
- ➤ Gottfredson, M. R., & Hirschi, T. (1986). The true value of lambda would appear to be zero: An essay on career criminals, criminal careers, selective incapacitation, cohort studies, and related topics. *Criminology*, 24, 213-234. https://doi.org/10.1111/j.1745-9125.1986. tb01494.x
- Gottfredson, M. R., & Hirschi, T.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Gottfredson, M. R., & Hirschi, T. (2020). *Modern control theory and the limits of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Greenwood, P. W., & Abrahamse, A. F. (1982). *Selective incapacitation*. Rand Corporation.
- ➤ Henry, J. S., & Jacobs, J. B. (2007). Ban the box to promote exoffender employment.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6*(4), 755-762. http://doi.org/10.2139/ssrn.3119658
- ➤ Jarrett, D. W., Corcoran, S. M., & Greenberg, R. I. (2019, April 22).

 New mexico adopts ban-the-box, expungement laws. JacksonLewis.

 https://www.jacksonlewis.com/publication/new-mexico-adopts-ban-box-expungement-laws
- ➤ Karimi, F. (2019, June 28). *Pennsylvania is sealing 30 million criminal records as part of Clean Slate law*. CNN. https://edition.cnn. com/2019/06/28/us/pennsylvania-clean-slate-law-trnd/index.html
- ➤ Kirk, D. S., & Sampson, R. J. (2013). Juvenile arrest and collateral educational damage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8(1), 36-62. https://doi.org/10.1177/0038040712448862
- ➤ Kurlychek, M. C., Brame, R., & Bushway, S. D. (2006). Scarlet letters and recidivism: Does an old criminal record predict future offending.

- *Criminology & Public Policy*, *5*(3), 483-504. https://doi.org/10.1111/j.1745-9133.2006.00397.x
- ➤ Kurlychek, M. C., Brame, R., & Bushway, S. D. (2007). Enduring risk? old criminal records and predictions of future criminal involvement. *Criminology & Delinquency*, *53*(1), 64-83. https://doi.org/10.1177/0011128706294439
- Laub, J. H., & Sampson, R. J. (2003). Shared beginnings, divergent lives: delinquent boys to age 7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gal Match (2020, November 26). What are three strikes laws?. https://www.legalmatch.com/law-library/article/three-strikes-laws-in-different-states.html
- Love, M., & Schlussel, D. (2020a, February). *Pathways to reintegration: Criminal record reforms in 2019*. Collateral Consequence Resource Center. https://ccresource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Pathways-to-Reintegration Criminal-Record-Reforms-in-2019.pdf
- ➤ Love, M., & Schlussel, D. (2020b). The many roads to reintegration: A 50-state report on laws restoring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after arrest or conviction.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Resource Center.
- Love, M. (2009). Alternatives to conviction: Deferred adjudication as a way of avoiding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 22(1), 6-16. https://doi.org/10.1525/fsr.2009.22.1.6
- Lowenkamp, C. T., & Latessa, E. J. (2004). Understanding the risk principle: How and why correctional interventions can harm low-risk offenders. *Topics in Community Corrections*, 2004, 3-8.
- Mannheim, H. (1933), German prevention of crime act.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6(4), 516-537.
- ➤ Miller, J. (2019, March 16). Utah lawmakers pass the "clean slate" bill to automatically clear the criminal records of people who earn an

- *expungement*. The Salt Lake Tribune. https://www.sltrib.com/news/2019/03/14/utah-lawmakers-pass-clean/
- ➤ Mueller-Smith, M., & Schnepel, K. (2021). Diversio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8(2), 883-936. https://doi.org/10.1093/restud/rdaa030
- ➤ Nagin, D. S., & Paternoster, R. (2000).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and state dependence: State of the evidenc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16*, 117-144. https://doi.org/10.1023/A:1007502804941
- ➤ Nagin, D. S. (2016).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 and criminal career research.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53, 356-371. https://doi.org/10.1177/0022427815611710
- ➤ Pager, D. (2003). The mark of a criminal reco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5), 937-975. https://doi.org/10.1086/374403
- ➤ Pager, D. (2006). Evidence based policy for successful prisoner reentry.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5*(3), 505-514. https://doi.org/10.1111/j.1745-9133.2006.00391.x
- ➤ Pager, D. (2007). *Marked: Race, crime, and finding work in an era of mass incarcer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Piquero, A. R. (2004). Somewhere between persistence and desistance: The intermittency of criminal careers. In S. Maruna & R. Immarigeon (Eds.), *After crime and punishment: Pathways to offender reintegration* (pp. 102-125). Willan Publishing.
- ➤ Piquero, A. R., Moffit, T. E., & Wright, B. E. (2007). Self-control and criminal career dimens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3, 72-89. https://doi.org/10.1177/1043986206298949
- ➤ Pogarsky, G. (2006). Criminal records, employment, & recidivism.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5(3), 479-482. https://doi.org/10.1111/

- j.1745-9133.2006.00393.x
- ➤ Prescott, J. J., & Starr, S. B. (2020). Expungement of criminal convic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Harvard Law Review*, 133(8), 2460-2556. http://doi.org/10.2139/ssrn.3353620
- ➤ Radzinowicz, L., & Hood, R. (1980). Incapacitating the habitual criminal: The english experience. *Michigan Law Review*, 78(8), 1305-1389. https://doi.org/10.2307/1288371
- Raphael, S. (2011). Improving employment prospects for former prison inmates: Challenges and policy. In P. J. Cook, J. Ludwig & J. McCrary (Eds.), *Controlling crime: Strategies and tradeoffs* (pp. 521-565).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skin, H. W. (1987). Longitudinal predictors of serious substance us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5, 715-740. https://doi.org/10.1111/j.1745-9125.1987.tb00816.x
- ➤ Rikard, R. V., & Rosenberg, E. (2007). Aging inmates: A convergence of trends in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Journal of Correctional Health Care*, 13(3), 150-162. https://doi.org/10.1177/1078345807303001
- ➤ Sampson, R., & Laub, J. H. (2005). A life-course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im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602(1), 12-45. https://doi.org/10.1177/00027 16205280075
- Sampson, R. J., & Laub, J. H. (1993).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s and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midt, P., & Witte, A. D. (1988). Predicting recidivism using survival models. Springer-Verlag.
- Schwartz, R. D., & Skolnick, J. H. (1962). Two studies of legal stigma.

- Social Problems, 10(2), 133-142. https://doi.org/10.2307/799046
- ➤ Shoag, D., & Veuger, S. A. (2021). Ban-the-box measures help high-crime neighborhood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64*, 85-105. https://doi.org/10.1086/711367
- ➤ Sigler, R., & Culliver, C. (1990). Effectiveness of the habitual criminal Act: An assessment of criminal hist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15, 105-121. https://doi.org/10.1007/BF02887459
- Skardhamar, T. (2010). Distinguishing facts and artifacts in group-based modeling. *Criminology*, 48, 295-320. https://doi.org/10.1111/j.1745-9125.2010.00185.x
- ➤ Uggen, C. Vuolo, M. Lageson, S., Ruhland, E., & Whitham, H. K. (2014). The edge of stigma: An experimental audit of the effects of low-level criminal records on employment. *Criminology*, 52(4), 627-654. https://doi.org/10.1111/1745-9125.12051
- ➤ Walker, S. (2015). Sense and nonsense about crime, drugs, and communities. (8th ed.). Cengage.
- ➤ Weisburd, D. (2015). The law of crime concentration and the criminology of place. *Criminology*, 53(2), 133-157. https://doi.org/10.1111/1745-9125.12070
- ➤ Widom, C. S. (2014). Varieties of violent behavior. *Criminology*, *52*, 331-344. https://doi.org/10.1111/1745-9125.12046
- ➤ Wolfgang, M. E., Foglio, R., & Sellin, T. (1972). *Delinquency in a birth coho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ara, G., & Farrington, D. (2016). *Criminal recidivism: Explanation,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Routledge.